

【名家背影】

## 杨绛的选择

□ 陈伟

杨绛是著名文学家钱钟书之妻,自身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作家。十多年前,笔者在北大上学时,即知有杨绛其人,亦知她出了如《洗澡》、《我们仨》这样的书,翻译过柏拉图的《斐多》。但我从未读过她的文字,哪怕是一小篇文章,迄今亦然。这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是工作缘故,学术专业书的阅读任务繁重,读闲情逸致的书,不免是一种奢侈了。

2016年5月,杨绛先生在105岁高龄时去世,一时也引起媒体的关注。杨绛与钱钟书夫妇是经历过建国后所有政治运动而能在改革开放之后安度晚年的那一代人。关于其二人在那些运动中的状况,便会引出一些争议。“文化大革命”期间,钱、杨夫妇二人作为知识分子亦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让人觉得值得同情。钱钟书是文化名人,今人反思那段历史,有时亦会对其消极遁世的态度产生质疑。尽管学者个人有过清静生活的自由,但学者是否亦要虑及苍生,发挥一些力所能及的作用呢?

不久前,在地摊淘书,偶得一本《郑恩波散文选》(蓝天出版社,1993年),才一元钱。若非是一元一本,这样的书我也不回买的。因为作者郑恩波是何许人,我从未听过。非名家的散文集,读来又有何益呢?不过,一元钱有时连一瓶水也买不到,开卷有益,买了闲时翻翻,多少有些价值吧。或许是隔行隔山,抑或时过境迁,这个郑恩波,当年亦有些大的名声。据该书“作者简介”中称,郑恩波,满族,1939年出生于辽南盖州,1958年始发表作品,1964年北大俄语系毕业,曾任《人民日报》记者,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名记者。1988年,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然而,翻了几篇,发现这本散文选可读性甚差,虽自称学

孙犁的荷花淀派,但要找出一篇名品佳作,亦是困难。不过,在这本价值寥寥的书中,亦有一篇稍稍可读,题为《人格》,讲的是作者与杨绛交往之事。杨绛原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恩波与她曾有一个时期是同事。据作者称,他与钱、杨二人的交往,在“文革”时期就有了。

作者所叙,不过几个片段:1973年,在北京东单市场附近路遇杨绛,杨绛当时名季康。杨绛不因作者为右派分子而改变态度,仍呼其为同志,并称赞作者曾经善待过他们:1967年春,钱、杨二人成了专政对象,成了“牛鬼蛇神”,靠边站,整天不是扫院子,就是拖擦楼道,楼梯。有一天,郑恩波站在楼梯口,大声对别人喊:大家先别走!楼道还没有干,大泥脚一踩,就前功尽弃了。杨绛以为她的劳动受到尊重,故而自那时即认定郑恩波为好人。多年后,杨绛仍然记得这事,当面向郑恩波表示感谢,故而郑恩波感到“良言一句三冬暖”。

第二个场景,是作者在1977年春盖房子,杨绛听说后,托人送来了200元。这应当是民间习俗,起房造屋亲朋好友要送“人情”,以表示资助,通常“人情”都是要还的。不过,当时2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可见钱、杨二人的慷慨。作者接着写道:“从这时起逢年过节,我总是将当年收获的好大米和自己亲手养的肥母鸡送到杨绛先生家里。我觉得每去她家一次,心灵深处都得到一次净化。可是,连续去过几次后,我就不好意思再去了,因为每次离开她家时,她都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信封塞进我兜里。不消说,信封里又是钱,又是粮票。末了,她还要和钱钟书先生一起送我下楼,像嘱咐亲人似的叮咛我:‘孩子正长身体,该给她们多买些营养品……’”

第三个片段是钱、杨拒绝

了作者在社科院任干部时给他们录音、录像的事。他与此二人有多年的友情,然而杨绛却严肃拒绝,说把机会留给其他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并说:“今后凡只图虚名而不务实的事儿,都不要再找我。顾问啦、理事啦,我一律都不当。”也正因此,钱、杨二人当时未留下录像、录音资料。这当然体现了他们的淡泊,却不利于后人研究学习了。

读罢这篇文章,我对钱钟书、杨绛二人后来为何不问世事突然理解了。这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经历灾难后的选择。很可能,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在“文革”结束后还在人间活着就不错了。他们的同行中,多少人在那场浩劫中含冤而死,悲惨至极。杨绛的人格,如郑恩波所言,是高尚的。我们后来的人,未经历过如此狂风恶浪,还是不要轻易谴责他们的选择了。钱、杨夫妇如能积极一点,更多地承担起一些公共责任,固然不错,但他们做出他们的选择,不图虚名,而做点实际的小事,回报社会,亦是颇值尊重的。更何况,他们的记忆深处,必定还有那些痛苦的记忆。

不久,我读到日本学者莫之宜佳的文章《杨绛和西方文化:探险——苦难中的安慰——转化》一文,更加确信之前的判断。依据莫之宜佳的叙述,杨绛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名气比钱钟书要大得多。她写了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和悲剧《风絮》,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大获成功。1949年前夕,她和钱钟书原本可以出国,但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表示“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第一场政治运动中,即“三反”运动中,作为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钱、杨二人即受到打击。人民日报社论中批评杨绛在课堂上讲狄更斯《大卫·考伯菲》的颓废爱情,毒害

学生。针对杨绛,专门开了批判大会。之后,反右运动时,她的学术论著自然也是批判对象。1966年“文革”爆发后,杨绛看到污蔑钱钟书的大字报,就深夜一人悄悄张贴了一张反驳的小字报。这被看做是“犯罪”行为,杨、钱二人于是被强迫戴着高帽子游街,边走边敲锣,承认自己的罪行。杨绛还被剃了阴阳头(头发剃掉一半,表示是“牛鬼蛇神”)。1969年,他们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2年回京时,原来的房屋被人强占,只能到女儿在北师大的教工宿舍去住。到1975年,夫妇二人有了北京三里河自己的住处。自政治运动开始后,杨绛即不再写文章,而专事翻译。她译的《堂吉诃德》手稿,“文革”中被没收,她从垃圾堆里将其找回。莫之宜佳说:“在政治运动期间,杨绛和钱钟书靠着他们的机智、勇气和幸运生活着。”

而在改革开放后,杨绛在七十多岁时,开始了创作的新高峰。她发表了以政治运动为题材的《干校六记》、《洗澡》以及多篇关于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散文,在全国引起轰动。这在当时对于人们反思“文革”、解放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临近生命的垂暮之年,经历了丈夫和女儿的去世,她更是对生死进行了激情而忧伤的思考。

在杨绛的散文《孟婆茶》中,杨绛说,在梦幻世界中一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列车上,“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家的座,标着英、法、德、日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杨绛是教师、作家、翻译家,然而她却说,其实她都不是,没有“她的位子”。她是“谦虚”的……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童年的时候,我是对死亡抱有好奇心的。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大概是在小学一年级。对死亡完全没有概念,只略微知道,这个人,可能以后永远见不到了。

我母亲悲痛欲绝。整个大家庭里的人都聚拢在院子里哭送父亲,唯有我,和别的小孩子一样,呆立在一旁,内心塌陷,不知所措,希望有人过来抱抱肩膀,安慰一下,告诉我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但是没有人这么做。我长大之后,莫名其妙地,心头总有一种罪恶感,觉得父亲的死和自己有关。再深一点去思考,其实是因为自己当时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而感到愧疚。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29岁。在我29岁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以后每多活一天,都是额外的、多余的、被命运所赠送的。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内心一定是有些什么陪伴父亲一起死去了。

或是因为过早地面对过生离死别的场景,我对死亡并没有

恐惧,当然,也有可能童年的心灵出于一种自我保护,采取麻木的方式阻挡了恐惧。死亡是什么?我对它有一定的好奇心。

死亡是眼泪,死亡是冰冷,死亡是黑暗,死亡是伸出手去只能握到一片虚空?是,好像又不是。

少年时我常穿过乡村的一大片坟地,那里草木深邃,安静肃穆。通过那里的时候,会觉得死亡是一个永恒的居所,是争吵与喧闹的结束,是一种恒定与永久。有夕阳照射的时候,死亡甚至会有一丝暖意。

我经历的第二个亲人的离世,是我的爷爷。如同所有身在异乡的人那样,害怕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因为那个电话,往往意味着一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消息。

七年前,这个电话还是打了过来。那是个清晨,我被家里的固定电话吵醒,打开手机一看,有十几个未接来电,有好几个未读短信。在拿起听筒的那一瞬间,内心已经明白,将要听到的,是一个黑色消息。

乘坐回乡的火车,穿过城市与田野,铁轨撞击的声音,还有火车尖锐的鸣笛,仿佛都在提醒着将要面临的一次告别。那个时候很难熬,心像是煮在油锅里。

见到了爷爷最后一面。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亲人的过世。死亡是真的可以看到的。它降临的速度是缓慢但又不可抗拒的,如阴云压顶,如蚁阵行军。可以看到死亡的气息在空

中以某种形状在移动,在等待最后时刻,它以俯冲的态势夺走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在一声叹息之后,剩下的就是永久的安宁。

人到中年,死亡就成为一个你不想参加却又不得不参加的仪式。

三年前,二婶去世了。她在街上不小心被三轮车撞了一下,受到了一点惊吓,回到家后到淋浴房去洗澡,可能是水温有点高,导致了晕厥,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亲人去世,最痛苦的是孩子。我回家奔丧,二弟看到我进门,抱着我就哭,“大哥,我以后就没有妈了”……两个人泪流不止。眼泪有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但更多还是对活着的孩子们的疼惜。

二婶对我很好,经常把我叫到她家里吃饭。每次我回老家,看见她都很开心,还像我小时候那样喊我的小名。在她去世前的那个春节,我带二婶去县城街上,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她很开心。那是我第一次给她买衣服,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

于是也明白了,对一个人好,要在TA活着的时候多关心TA,一旦阴阳相隔,就再没有机会。

去年底,四叔也走了。同样痛苦的心理历程,又走了一遍。我写过一篇文章《他是世间一枚笨拙的陀螺》纪念他。四叔为了他的那个家庭,为了儿女能生活

得好一些,像一枚陀螺那样不停地转、不知疲惫地转,直到自己转不动了为止。去埋葬四叔的时候,我和弟弟们把人们祭奠的盆花都带到了墓地上,在新坟周边挖了二十多个小坑,把那些鲜花都栽了进去,把车里的一整箱矿泉水都拆了打开,浇灌这些花。这该是四叔这一辈子第一次收到鲜花,也是唯一一次收到这么多鲜花吧。它们在冬天枯萎,可根却留在了土壤里,春天来的时候,幸运的话,那些花还会开。在栽下那些花的时候,想到明年春天,四叔的墓边会开满鲜花,不禁在心头微笑了一下。

写下这么多,其实如何理解死亡、如何诠释死亡都不重要了。那么多的诗人、作家都曾描述过死亡,但每个人对死亡的认知与感受不会是一样的。有的人很害怕,有的人很淡然,有的人逃避谈论这个话题,也有的人选择直面。

死亡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时间不过是一把尺子,可以丈量与死亡之间的距离。艾米丽·迪金森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描述了她与死亡之间的距离,按照诗歌里的描述,是在一辆马车上同车乘坐,她用轻松甚至有点戏谑的风格,来讲述她对死亡的态度。

“我们缓缓前行,他知道无需急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暇,以回报他的礼貌。”我在这首诗里,读到过世的亲人,也读到了自己。

(本文作者为知名专栏作家)

【人生随想】

## 我不惧怕死亡

□ 韩浩月